日本 1992 年清史研究概况

文 平编译

一、清（1840 年以前）

地域社会 八十年代以来，“地域社会”论在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占据了支配地位。社会经济史学会编纂的《社会经济史学的课题与展望》一书，就是对这一研究动向的整理和反映。其中，与明清史有关的研究成果有：岸本美绪的《明清时期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变化》、川胜守的《明清农业史》、山田贤的《中国历史上的人口流动与社会变化》等。较之古典的经济史，这些研究侧重于从社会史方面来分析探讨，十分引人注目。1992 年，这方面的研究继有进展。森正夫编的《江南三角洲市镇研究》一书（名大出版会），尝试由实地调查这一新方法着手来研究地域社会。作者把江南三角洲的市镇作为调查对象，探索历史学和地理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给既往的地域社会论吹进了一股新风。但是，如何把文献史料和社会调查更有机地结合起来，仍是这一研究方法所需要继续探讨的问题。滨岛敦俊的《明清江南城隍考·补考》（唐代史研究会编《中国的城市和农村》），运用了同样的研究方法，论述了以市镇为核心的生活圈的形成以及与此相应的祭祀圈的演变情况。川胜守的《中国近代城市汉口与〈汉口丛谈〉》（《史渊》129），对威廉·罗姆在有关汉口地域社会的研究中忽略乾隆以前情况的做法提出了批评，文章把《汉口丛谈》作为了解清代前中期汉口状况的线索，并对这部史料作了介绍。铃木博之的《清代徽州府的宗族与村落》（《史学杂志》101－4），根据安徽省歙县江村村志，并以该村望族江氏的族谱《橙阳散志》为史料依据，通过对徽州商人江氏的分析，多方面地叙述了江村这一地区的社会面貌。作者的观察是多角度的，为地域社会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实例。则松彰文的《清代的“境”与流通》（《东洋史论集》〈九大〉20），指出在十八世纪的粮食政策中广泛存在“境”的概念．国家一方面严禁限制米谷贸易的地方主义政策，支持米谷在全国的自由流通，另一方面仍原则上禁止跨越省境的官粮采买，本身即具有“境内解决”的意向。由此可以窥见一个进行全国性米谷需求调节的国家，“境”的概念实际上体现出对地域社会经济主权意识的一定程度的尊重。但“境”这一词无论用于州县等地域社会，抑或用于督抚管辖下的省的范围，在当时是否存在这么明确、具体的地域概念，仍有进一步加以研究的余地。安野省三的《清朝中期秦岭的风俗》（《神田信夫先生古稀纪念论集·清朝与东亚》，山川出版社，以下简称《神田论集》），以严如熤《奉檄巡查商州西凤山内感赋》为依据，叙述了陕西省秦岭山脉一带的风俗民情。武内房司的《清代云南山民的骚乱》（《呴沫集》7），认为 1820 年傈傈族骚乱蜂起，其原因在于汉族的移民、开发破坏了当地的生活环境和传统的生活方式。

政治 岩井茂树的《中国专制国家与财政》（佐佐木润之编《中世的政治与战争》、〈中世史讲座 6〉），总结概括了宋代以来的中国财政问题．重点研究对象则是清代。作者认为，清代财政的特点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从公共业务的规模来看，财政规模较小，特别是军费的比

重要比历代王朝偏低；(2) 财政原理是不计算经济增长和物价变动的"原额主义"，很多开支不计入地方费用，因此，为弥补财政不足，必然要实行正额以外的征收；(3) 正额之外征收的扩大，不可避免地腐蚀了社会和政治秩序。作者强调了贯穿专制国家财政的"原额主义"原则本身所必然包含的矛盾。冈本隆司的《清代粤海关的征税机构》（《史林》75--5），批评了那种把公行垄断贸易视为广东贸易本质的传统见解，同时论述了清朝政府为使粤海关征税一元化而制订旨在把商人组织起来的保商制度的经过。该文提出了从海关本身作为征税机关所具有的职能这 一角度来分析问题的思路，从而对过去主要把海关视为物资集散地的海关研究产生了新的影响。松浦章的《关于清代前期的海关监督》（《文学论集》、〈关西大〉41－3、4），根据地方志编制了就任闽海、粤海、江海、浙海四海关监督的官员一览表。他的另一篇文章《清代海关与中国海船》（《阡陵》），介绍了清代海船携带的通航证的有关情况。他的第三篇文章《明清时代北京的会同馆》（《神田论集》），则以朝鲜使节的记载为主，再次论述了作为接待外国 使节公馆的会同馆的有关问题。山田耕一郎的《监察御史陆陇其与捐免保举问题》（《神田论集》），围绕康熙年间的捐纳制，论述了试图依靠捐例增加财政收入的行政官僚与想要抑制捐纳出身者仕途发展的正途出身者之间的对立和矛盾。香坂昌纪的《雍正年间的关制改革与背景》（《东洋史论集》，〈东北大〉5），认为在考察雍正皇帝废除关差的措施时，除了应该考虑其经济因素外，还应该分析其政治的原因。作者大胆提出，在关制改革中，雍正帝试图排除对其形成潜在威胁的诸王的亲信人员并切断他们的经济来源。山本英史的《雍正年间绅衿抗粮处分考》（《中国近代史研究》7），认为雍正年间虽然决定对那些滞纳税粮的乡绅进行处分，但由于地方官的庇护，使得这一处分实施起来大打折扣。作者强调指出，这一状况表明了清朝专制国家的脆弱性。

思想 井上进的《朴学的背景》（《东方学报》，〈京都〉64），考察了当时在清朝思想高压和统治下形成的学风。武内房司的《清代青莲教的救济思想》（《中国——社会与文化》7），介绍了嘉庆、道光时期流行于四川、贵州的袁无欺的青莲教思想。认为这一思想通过信仰无生老母来解释、批判功利主义风潮，并主张通过禁欲生活使人类回归至本来的状态。大泽显浩的《〈肇域志〉的编纂与成书》（《东洋史研究》50－4），认为明嘉靖、万历以降编纂实用性的地理书籍受到社会和学界的重视，顾炎武的《肇域志》作为一种总志，就是在此背景下，为探求历史地理的准确性而编纂成书的。松田吉郎的《与桑园围基有关的地方志的编纂过程》（《研究纪要》，〈兵库教大〉12），以广东与桑园围基有关的三种地方志为例，说明随着乾隆以来水利建设方法从部分修筑到全围修筑的转变，"围志"的编纂成为必要之举。

最后要提到的是，1992 年出版的有关著作有：川胜守《明清江南农业经济史研究》（东大出版会）、小山正明《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东大出版会）、酒井忠夫《中国民众与秘密结社》（吉川弘文馆），我们期待着关于它们的专评。

二、近代

社会经济 在地域社会方面，近年来，研究视角开始由以往的土地所有关系转向对宗族的重视。菊池秀明的《太平天国前夜广西地区的移民与"客籍"精英》（《史学杂志》101－9）和《广西藤县北部的移民与太平天国》（《中国近代史研究》7）两篇论文，着眼于广西社会内部的情况，探讨了太平天国发生的基础。作者利用在广西金田和李秀成出生地大黎乡两地收

集的族谱和人们的口述材料，揭示了汉族移民社会以望族为中心的社会秩序的形成过程，并将宗族之间的对立与拜上帝会的渗 透结合起来加以考察，确实很有意义。不过，仅止于揭示太平天国发生的前提条件似乎还不够，我们期待这一研究在今后得到进一步展开。西川正夫的《四川省隆昌县郭氏札记》（《论集》，〈金泽大·文〉史学 12〉，通过对四川省隆昌县郭氏的研究，描述了清末民初乡绅的存在形态。作者认为，郭氏家族的兴盛，是借助夏布的生产和流通来实现的。这一研究，对考察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与乡绅的关系不无裨益。

在土地所有关系方面，夏井春喜的《太平天国与苏州农村》（《纪要》，〈北海道教大〉社会科学 43—1），考察了太平天国对苏州地方的地主及租佃关系带来的影响，指出收租形态由私而公的转变，使收租纳租的实际状况由私收而转为公收，这是很有意义的研究。不过，纳租以外的有关农业经营的各种问题，诸如生产性与市场经济的关系，仍有待探讨。作者的另一篇论文《清末民初时期江南的租栈经营》（《史流》32），根据对苏州某一租栈簿册的数量分析，指出名副其实的地主在民国初期有所增加。小岛淑男的《清末民初时期江南的田业会》（《神田论集》），论述了地主以及佃户之间各种各样的组织。

有关市场经济和地方财政的研究方面，森正夫所编的《江南三角洲市镇研究》（名大出版会），考察了江南地区市镇的过去和现在。其中第三章内稻田清一撰写的《清末江南的镇董》一文，指出在清代末年，有权有势的镇董管辖着以市镇为中心的行政区域，这一在开港通商以前业已存在的体制，是在市场经济发达的背景下建立起来的。森胜彦的《清代和民国时期山东省的中心地区（一）》（《论集》〈鹿儿岛经济大〉33—1），以地方志为依据，对山东省定期集市的分布与变迁作了量化的分析。但各地方志对定期集市的确定可能具有不同的标准，故而根据不同的条件确认不同的数字就显得十分必要了。山本进的《清代后期的四川地方财政》（《史林》75—6），以四川省的财政为例，结合分析开港以前的情况，指出十九世纪后半叶厘金制度的实施以及地方财政自主权的增加，无非是乾隆中期以来商业税制与财政状态的继承和发展。冢濑进的《中国近代东北地区的农业发展与铁路》（《社会经济史学》58—3），作者在他的研究中，摒弃了帝国主义支配的政治观点，客观地考察铁路给予东北经济的影响，认为由于铁路开通而带来的移民流入和农产品输出，影响了二十世纪上半叶东北地区农业的发展。然而，如果围绕铁路问题来搜集整理资料，就必然要考虑到在外在因素影响下面向世界市场的周边部落的农业问题。。就此而言，作为一种方法或视角，探讨地域内部的发展问题，也是不无必要的。篠永宣孝的《云南铁路与法国帝国主义》（《土地制度史学》136），探讨了法国列强与铁路建设的有关问题。宫田道昭的《清末潮州地方的砂糖贸易与地域社会》（《神田论集》），以广东省潮州地方为研究对象，指出该地区依靠面向沿海市场的砂糖贸易而富裕了起来。

关于近代中国工业化问题的研究，去年出版了铃木智夫的著作《洋务运动研究》（汲古书院）。其中收录的《上海 机器织布局的创设过程》一文，探讨了西方技术在传入中国时所遇到的困难——中国棉花不适宜用作机械纺织的原料。作者叙述了当时中国在实行工业化过程中面临的客观困难，从而改变了以往把影响近代中国工业发展的责任完全归咎于洋务派的传统看法。菊池敏夫的《清末的工业化与机械工》（《神田论集》），考察了福州船政局内掌握西方生产技术的熟练工人的状况。本野英一的《下关条约第六条第二项第四问题再考》（《中国近代史研究》7），以英国一方为中心，考察了下关条约订立之前，围绕外国棉纺织工厂设立问题而产生的中英经济纷争。佐佐波智子的《十九世纪末中国港口市场与内地市场的关系》（《社

会经济史字》57—5)，以汉口的商业圈为对象，考察了外国商品由港口市场向内地市场的流通状况，指出了中国内部存在的地域性需求的差异。

政治 有关清末新政的研究引人注目。其中贵志俊彦的《“北洋新政”体制下地方自治制的形成》(横山英、曾田三郎编《中国的近代化与政治组合》，溪水社)，着眼于地域社会的问题，指出了新政的开展与地方自治组合的动向，以及都市一些实力阶层的活跃等现象的关系。文章对天津地方议会的设立、权限及其人员组成进行了研究，并说明了在新政体制下地方自治的发展情况。研究袁世凯北洋新政问题的还有吉泽承一郎 的《光绪末年天津巡警组织的设立与城市行政的变迁》(《史学杂志》101—12) 和桑田耕治的《北洋新军的建立过程与有关问题》(《兵库史学研究》38)。前者考察了天津巡警组织的设立与城市行政的变化，后者则从财政的角度探讨了北洋新军的状况。曾田三郎的《清末以产业行政为中心的分权化与集权化》(《中国的近代化与政治组合》)，阐述了商部意欲统辖地方产业行政的集权化尝试在地方的抵制下终至失败的情形。铁山博的《清末内蒙古的“移民实边”政策》(《地域综合研究》，〈鹿儿岛经济大〉19—2)，探讨了作为新政的一环，政府在内蒙古实行的土地转让的有关问题，并对这一政策在当地经济建设中所发挥的作用进行了评价。中村哲夫的新著《同盟的时代》(人文书院)，以中国同盟会的成立过程为中心，探讨了清末的变革运动。作者认为，就政治变革而言，由于立宪派和革命派在组织国民、建设国家等问题上观点大体一致，因而二者有联合的可能性。上村希美雄的《辛亥革命和大陆浪人(下)》(《论集》，〈熊本短大〉42—3)，详晰论述了与辛亥革命有密切关系的在日本的大陆浪 人的有关情形。

关于民众运动的研究，并木赖寿的《民众叛乱与中国近代社会》(《响沫集》7)，探讨了民众叛乱 的有关问题，作者认为，民众叛乱 组织内部，同样具有与王权支配相同的权威主义的因素。

关于教育的研究，高田幸男的《清末地域社会与近代教育的传入》(《神田论集》)，探讨了无锡地区依靠地方绅士、知识阶层之力传播近代教育的情形。小林善文的《中国近代的初等教育》(《东洋史研究》51—1)，根据现代教育的实际状况考察了初等教育的历史。

关于中日关系的研究，茂木敏夫的《中国“近代”的重编与日本》(《殖民帝国日本》，〈岩波讲座 近代日本与殖民地1〉)，围绕朝鲜、琉球、台湾，考察了日中两国的外交关系。作者认为，十九世纪后半叶，东亚传统的秩序发生了变化，为与意欲建立新的国际关系的日本相对应，李鸿章的外交政策也由传统的注重不紧密的边境、属国关系转为越来越依靠实力来进行支配。粟原纯的《日清战争与和谈交涉》(《史论》45)，探讨了中日甲午战争时期的和谈问题。神户辉夫的《日清两国在初期间岛问题上的纷争事件》与黑屋敬子的《吴禄贞与间岛问题》(《研究纪要》，〈大分大・教育〉14—1)，都是有关间岛问题的论文。菅野正的《福建辛亥革命与日本》(《纪要》，〈奈良大〉20)，阐述了日本对福建地区辛亥革命的反应。原康纪的《明治时期的长崎贸易：外国商社的进入与交易》(《经济与研究》，〈九大・经济・57—2〉)，探讨了中国商人在长崎的状况。作者认为，十九世界八十年代，中国商人确立了贸易的支配地位，至明治末期出现衰落的迹象。中村义的《亚细亚主义的系谱》(《纪要》，〈东京学艺大〉社会科学43) 与村上胜彦的《产业革命初期的日中贸易》(《东京经大学会志》174)，是以日本人为考察对象的研究日中贸易关系的论文。前者以早期在上海从事贸易活动的岸田吟香为主，认为他主张通商立国的思想及行动，是承荒尾精而来的，从而形成了亚细亚主义的系谱。后者则详述了荒尾精建立日清贸易研究所与日中贸易期间日本商权恢复过程的关系。饭岛涉的《商业会议所资料》(《中国近代史研究》7)，介绍了与中国有关的日本商业会议所的

资料。松泽弘阳的《幕府末期的西洋之行与中国见闻（一）（二）、（《法学论集》，〈北大〉38—5、6，43—2），是指出日本人对中国的错误认识的力作。作者以幕府末年开国初期的日本使节团和留学生的西洋之行为例，指出他们根据在国外认识的中国所形成的中国观及世界观，成为近代日本的基本认识。并且，这样的中国认识在此后的日本社会不断产生影响，甚至到今天都在制约着人们。佐佐木正哉的《外国人的广州进城问题与〈别段风说书〉》（《神田论集》），根据日本流传的荷兰《别段风说书》，探讨了鸦片战争后广州的进城问题，并指出了日中两国在接受海外情报方面存左的差异。佐佐木扬的《清朝首届驻英公使郭嵩涛的明治初期日本论》（《东方学》83），坂出祥伸的《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的明治维新论》（《文学论集》，〈关西大〉41—4），区建英的《中国对福泽谕吉的理解》（《日本历史》525），都是关于中国知识阶层对日本认识的论文。这些论文反映了当时中国在评价日本接受西方文化这一问题上所出现的偏颇。桥本南郭子的《清代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设立和它的历史作用》（《纪要》，〈东海大·外国语教育中心〉12》，比较了中日两国翻译西方书籍的状况，并对双方在译书方面的关系作了探讨。此外，大谷正的《日本外务省在中国以及朝鲜的"新闻操纵"》（《法学论集》，〈专修大〉55、56）和中村孝志的《台湾总督府华南新闻工作的开展》（《学报》，〈天理大〉171），都是探讨日本在中国各地的新闻工作这一独特问题的论文。

思想与政治史的研究倾向相同，思想史方面对改革思想的研究亦颇引人注目。村田雄二郎的《孔教与淫祠》（《中国——社会与文化》7），饶有兴味地考察了康有为提倡的孔教国教化的历史意义。董士伟的《新文化运动与"孔教"》（《中国——社会与文化》7，高柳信夫译），探讨了陈独秀与孔教的论争。作者认为，康有为和陈独秀都在向近代化的同一方向努力，他们的分歧在于对文化理解的不同。滨久雄的《康有为的变法思想与春秋学》（《纪要》〈大东文化大·人文〉30），由康有为的著作《春秋董氏学》入手，探讨了他的春秋学说。林来梵的《中国立宪主义的形成与发展》（《国际地域研究》，〈立命馆大〉3），考察了二十世纪初期的立宪主义思想。作者分析了清末宪法，认为由此可以看出国家优越地位的特征与当政者所存在的"缺乏能承担宪政的国民"这一认识。这种认识在孙中山的思想中也同样存在。中山义弘的《孙中山国民组合理论的结构》（《中国的近代化与政治组合》），指出在孙中山的政治思想中，有"自上而下的国民组合"这样的国家建设优先的想法。细野浩二的《日本和中国面对"西方冲击"的态度（下）》（《纪要》，〈早大·院·文学〉哲学、史学37），由探寻日中两国面对国际秩序的反应这一角度出发，认为孙中山在对外认识的本质上仍然存在着华夷观念。

与思想史有关的其他论文还有，静田敬一的《〈圣武记〉与〈海国图志〉的关系》（《研究报告》，〈岐阜大·教育〉人文40），重新考证了《海国图志》中《筹海篇》的作者。村尾进的《〈海国四说〉的意义》（《东洋史研究》51—1），以最早介绍西方情形的书籍《海国四说》为例，指出了其认识的特征以及把西方状况作为"自身内部问题"来加以介绍的出发点。小松原伴子的《日俄战争前后的人种论》（《呴沫集》7），对二十世纪初期日中两国的人种论作了比较和研究。

此外，随着近年来中国开放政策的发展，日本学者在中国实地的资料搜集和见闻考查也开始进行。这类成果也反映在去年的研究中，如佐佐木卫编的《近代中国的社会与民众文化》（东方书店），即为有关华北农村的调查资料集。可以预料，今后这类活动将进一步得到开展。

（下转第54页）

(109) 民国《吴县志》卷51，物产。
(112) 杜受祜、张学君：《近现代四川场镇经济志》第一集，页89，四川社科出版社，1985。
(115) 乾隆《济宁直隶州志》卷31，吴怪文。
(129) 张鹏飞：《皇朝经世文编补》卷28，马国翰文。
(130) 民国《重修泰安县志》第3册，杂税。
(134)(136) 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页344，人民出版社，1985。
(137)《当代中国的轻工业》下册，页67。

(上接第116页)

[**说明**] 本文编译自日本《史学杂志》第102编第5号《1992年的历史学界——回顾与展望》。其中中国的明清部分和近代部分（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系由山本进和宫田道昭分别撰写。考虑到清史研究的连续性和整体性，因而分别从中摘译出有关清史的内容，仍分为“清”与“近代”两部分，以存原貌。